

# 柳诒徵与《学衡》

陈宝云

(上海电力学院 管理与人文学院,上海 200090)

**摘要** 学界对《学衡》主要人物的研究中常常忽视柳诒徵,或是将其在文化保守主义角度上等同起来。事实上,柳诒徵是除吴宓之外唯一一位《学衡》自始至终的支持者,但同时他在学衡社中处境特殊,思想主张也与《学衡》主流有很大差异。仔细梳理柳诒徵与《学衡》的关系,探讨其间异同,对于更全面地了解《学衡》,了解20世纪20年代丰富多彩的思想世界,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 柳诒徵 《学衡》;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 H203;K8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019(2008)05-0111-06

近些年来,学界有关《学衡》及学衡派学人的研究成果颇丰,这对于我们了解《学衡》,了解20世纪20~30年代广阔的学术文化场域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些研究较多关注学衡派群体或是吴宓、梅光迪等人,对柳诒徵的研究相对较少,<sup>①</sup>在提及思想时,多将其与《学衡》在文化保守主义角度上等同起来。<sup>②</sup>本文试图将其还原于《学衡》处境之中,对二者的关系作简单探讨,以求教方家。

## 一、柳诒徵对《学衡》的支持

“丹徒柳诒徵,不趋众好,以为古人古书,不可轻疑;又得美国留学生胡先、梅光迪、吴宓辈以自辅,刊《学衡》杂志,盛言人文教育,以排难胡适过重知识论之弊。一时反北大派者归望焉。”<sup>[1]</sup>在众人眼中,《学衡》是“北大派”的对立者,而柳氏则是其中的核心所在,也是当时对抗新文化、疑古运动的领袖人物,与留美学人胡先、梅光迪、吴宓一道,形成一股反“北大派”的势力。且不论把《学衡》放在南北对立的视角中来看待的做法是否合适,但柳氏的确是《学衡》不可或缺的主力与持续不懈的支持者。《学衡》文稿的充实、旨趣的实践与长久维持,都与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自始至终积极参与《学衡》出版事务。柳氏任教南高—东大之际,也是《学衡》杂志酝酿、创办、兴盛之时。《学衡》从1922年刊行第1期,至1926年12月以月刊形式刊行了60期,此后至1933年终刊,时断时续刊行了第61至79期。在发起人梅光迪、吴宓、刘伯明、胡先、萧纯锦、徐则陵、马承、柳诒徵和邵祖平等八人中,只有吴宓和柳氏二人坚持始终。

刘伯明对《学衡》的创办支持很大。“《学衡》杂志出世,主其事者,为校中少数倔强不驯之分子,而伯明为之魁”<sup>[2]</sup>;伯明为《学衡》创办人之一,其他作者,亦多其所引致之教授,与其私交甚密者”<sup>[2]B0</sup>。由于刘伯明的吸引,梅光迪、楼光来、吴宓等任教东南大学,不但为英文系开一新纪元,且以养成东大之人文主义学风焉”<sup>[3]</sup>。1923年11月,刘因病英年早逝,使《学衡》乃至东南大学都失去了一位能团结各方

<sup>①</sup> 忽略柳诒徵是《学衡》研究中的一般现象,研究者在论著中对柳诒徵常常短短几句带过,甚至有些研究《学衡》的专著也是如此。沈卫威的《回眸学衡派》(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在辟专章论《学衡》作者时,除有留美背景的作者以外,只分析了柳诒徵门人张其昀(在《学衡》发文两篇)。而现有的几篇研究柳诒徵的论文,也多是从史学家方面立论。如康虹丽的《论梁任公的新史学和柳翼谋的国史论》(载《中国史学史论文集(三)》,第454页(台北)华世出版社,1980年)、李宇平的《柳诒徵的史学》(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16期,第286页,1988年6月)等。

<sup>②</sup> 参见沈卫威《史地学报及其文化立场》《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

收稿日期 2007-12-20

作者简介 陈宝云(1976~),女,安徽怀宁人,上海电力学院管理与人文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博士后。

人士的核心人物。

梅光迪于《学衡》第13期始就不再供稿,自1923年起,就基本上脱离了《学衡》的实际事务,1924年赴美讲学,对《学衡》再没有过问。后来梅光迪甚至毫不掩饰地对人说:“《学衡》内容愈来愈坏。我与此杂志早无关系矣!”<sup>[4] 235</sup>

胡先 是早期学衡派成员中“对《学衡》杂志最热心而出力最多之人”,但他与吴宓分歧甚多。<sup>①</sup>1923年秋赴美攻读植物分类学博士,于《学衡》事便很少过问。<sup>[5] 337-438</sup>

其余几位创刊时期的社员,邵祖平、萧纯锦、徐则陵、马承 等人,与《学衡》的联系也多无疾而终。吴宓说,邵祖平“为社中最无用而最不热心之人。而独喜弄性气,与予一再为难”。<sup>[6] 256</sup>萧纯锦的专长为经济学,与《学衡》所设栏目基本上无关系。徐则陵虽为东南大学史学系主任,也曾留美,但于《学衡》杂志贡献不多。<sup>②</sup>

1924年,吴宓辞东南大学往东北大学,随后辞东北大学受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1925年,《学衡》发行第38期后就难以按期出版。吴宓在离东南大学前,选柳氏担任《学衡》南京编务处总干事。此后事务主要由吴宓与柳氏相商办理。吴宓在日记中多次提及他和柳氏商谈《学衡》编辑出版事宜,以及与柳氏一起游说中华书局总理陆费逵续出《学衡》等等努力。<sup>[6] 268</sup>《学衡》存在的近12年中,作为总编辑的吴宓将其视为己之事业,说“《学衡》为我之事业,人知我以《学衡》”;<sup>[5] 319</sup>而柳氏的坚持始终,对于《学衡》、对于吴宓来说,无疑都是一个积极而又坚定的支持。

撰写弁言,宣扬旨趣。《学衡》第一次会议,即推柳氏作“弁言”。<sup>③</sup>柳氏所写“弁言”即“述述中西先哲之精言以翼学。解析世宙名著之共性以邮思。籀绎之作必趋雅音以崇文。平心而言不事谩骂以培俗”。“弁言”是后世评价《学衡》很重要的依据,在汇集了东大文史哲各科知名教授及其他同人的学衡派中,由柳氏撰写弁言,则显示了其在东大的影响和地位。吴宓对于柳氏有记曰:“南京高师校之成绩、学风、声誉,全由柳先生一人多年培植之功。论现时东南大学之教授人才,亦以柳先生博雅宏通为第一人。”<sup>④</sup>同时,这或许也与柳氏在东大的高深资历有关(从清末的两江师范到民初的南京高等师范最后来到东南大学,柳氏的资历无疑最深)。<sup>⑤</sup>

随后,在《学衡》第三期上开始刊登的“学衡简章”,是更完整的社员共识,但基本上仍是围绕柳氏所写“弁言”而展开,<sup>⑥</sup>只不过在对象上更明确:

(宗旨)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

(体裁与办法)(甲)本杂志于国学则主以切实之功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着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而后来学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轨,不至望洋兴叹,劳而无功,或盲肆攻击,专图毁弃,而自以为得也。(乙)本杂志于西学则主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常慎取择,庶使吾国学子,潜心研究,兼收并览,不至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也。(丙)本杂志行文则力求明畅雅洁,既不敢堆积钗钉,古字连篇,甘为学究,尤不敢故尚奇诡,妄矜创造,总期以吾国文字,表西来之思想,既达且雅,以见文字之效用,

① 在创刊之初,就与吴宓因对诗的见解不一,将“诗录”一分为二,各自为政。

② 作为《学衡》始终的主事之人,吴宓对徐则陵印象不佳,认为其“实无学,故恒沉默寡言”,身为东南大学历史系主任,实为东南大学之羞耻。见《吴宓自编年谱》,第228页,三联书店,1995年。

③ “宓随即发言……第一期必须有发刊辞或《学衡》杂志社宣言刊于卷首……公推柳诒徵撰作‘发刊辞’一篇”。参见《吴宓自编年谱》,第229~230页。

④ 《吴宓自编年谱》(页228)中列有本班学生介绍,有缪凤林、景昌极、张其昀、王焕镛、束世澄等。从档案中也可证明当时此班的优秀者有陈训慈、胡焕庸、范希曾、王庸、向达等。参见《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民国十二年六月毕业生分数表》,《国立中央大学(1902-194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全宗号648。

⑤ 在清末两江师范时期,他就以29岁(1908年)青年俊才之名,受当时监督(校长)李瑞清之邀,接替赴京任职的刘师培历史教习一职。1915年,南京高等师范学院奉江苏省之命设校后,隔年他又被首任校长江谦从北京明德学院召回,就任国文、历史教员。参见柳曾符、柳佳编《勸堂学记》,第14~16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⑥ 吴宓说:“每次会议后,择取同人中主要发言,私自作成笔记。所作既多,乃归纳之,汇编为简短之三四条。在以后会议中,必将此三四条读出,经诸君讨论,并修改文字,作为‘正式通过’。即(一)于国学(二)于西学(三)于行文之三条‘主张’。旋即由宓编入《学衡》杂志简章中,刊登入《学衡》杂志第三期”。此后刊于每期首面。参见《吴宓自编年谱》,第230页。

实系于作者之才力。苟能运用得宜,则吾国文字,自可适时达意,固无须更张其一定之文法,摧残其优美之形质也。

积极撰稿,独占鳌头。《学衡》杂志设有通论、述学、书评、杂缀等栏目。除刊载诗词小说戏曲之类的“文苑”一栏外;“述学”类所占篇数最多;“通论”类次之,涉及时事、哲学、文学、史学各方面之论述。在所有79期《学衡》上,撰译各类文章最多的是柳氏(翼谋49篇),其次是吴宓(雨僧35篇)、缪凤林(22篇)、王国维(20篇)和胡先(步曾15篇),再次是汤用彤(锡予7篇)、刘伯明(6篇)、梅光迪(5篇)等。他们是《学衡》的中坚力量,其中“柳翼谋与吴雨僧致力尤多”。事实上,柳氏正是《学衡》文史方面的主将,其出刊率与出稿率最为翘楚,每期的出稿率达六成以上。从文章内容上看,他的文章大多刊载在分量较重的“述学”、“通论”与“书评”栏目中,而且从《学衡》创刊到正式停刊,柳氏的出稿率并无大起大落。<sup>①</sup>他还放弃《中国文化史》的稿费,将全书各篇在《学衡》分期发表。这在《学衡》因为经费与稿源不足而难以维持的后期,可以说是最有力的支持。<sup>②</sup>另外,由于柳氏历史系教授与《史地学报》指导员的身份,他的学生缪凤林、景昌极、张其昀、陈训慈、郑鹤声、王庸、向达等人也加入《学衡》作者队伍,他们的文章在整个《学衡》中也占了很大的比例。<sup>③</sup>

昌明国学,融通中西。《学衡》创办的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但其成员大多留美归来者,对国学有很深造诣的较少。梅光迪、吴宓、刘伯明和胡先等人多重在翻译介绍西学。李清悚回忆说:“1922年创办之《学衡》杂志,本西方一时盛行之人文主义,反对‘文学革命’之新说,以为有汨没中国文化传统之不良影响,与《新青年》等刊物相争论,在新文化运动中有异议,被视为保守方面,而校长亦适当支持其刊行,时流乃加以‘东大’‘学衡派’之称。此刊以梅光迪、吴宓二先生为发起之主将。时柳翼谋师则常有‘通论’文字在其中掲載,乃因师固通贯国史,不苟于趋时,而梅、吴以及参与校政之刘伯明先生皆游学美国……于国学俱疏,故屡求其写论为助。”<sup>[7]124</sup>

柳氏国学造诣甚深,吴宓就曾将他与梁启超相提并论:“近今吾国治国学者人师,可与梁任公先生联轸并驾,而致学方法亦相类似者,厥惟丹徒柳翼谋先生谄徵。两先生皆宏通博雅,兼包考据义理词章,以综合通贯之法治国学,皆粹其精力于中国文化史。皆并识西学西理西俗西政,能融合古今折衷中外之精言名论,皆归宿于儒学,而以论道经邦内圣外王为立身之最后鹄的,皆缘行道爱国之心,而不能忘情于政治事功,皆富于热诚及刚果之勇气,皆能以浅显犀利之笔,为家喻户晓之文,皆视诗词等为余事,而偶作必具精采,此皆两先生根本大端之相同处。”<sup>[7]112</sup>因此,在分工上,柳氏自然是“昌明国粹”的主将,其文章多于此处立论,如《汉官议史》、《华化渐被史》、《明伦》等等。这对《学衡》宗旨的实践起了很好的平衡作用。同时,柳氏与留洋回国的东大同仁们交游甚多,并不像当时东南大学国文系、历史系的一些硕老们,长年闭门自居,不问世事。<sup>④</sup>他的学术思想更有“融通”、“不居于一隅”的特色。<sup>[7]110</sup>在人才济济的《学衡》中被推举出来撰写“发刊辞”,决不是抱守残缺的“传统学究”所能胜任的。

在1925年《送吴雨僧之奉天序》中,他仍然积极肯定和支持吴宓、梅光迪“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实践:

晚清以来,学校朋兴。士挟走绝域,求一长以自效于国者无算。独深窥欧美文教之阃奥,与

① 79期中,柳诒徵只缺席过29期,从创刊号到1932年第75期,50期中都有文章,出稿率约63%。

②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在《学衡》第46期开始刊登,一直连载到第72期。《学衡》后期维持之艰难,可参见《吴宓日记》。

③ 其中以缪凤林最多(24篇),景昌极次之(23篇)。

④ 《吴宓日记》多处记载吴宓与柳的往来,不仅因为《学衡》刊行事务,更有朋友之间的聚会相交等。《雨僧诗文集》中也有《甲子六月十六偕吴雨僧吴碧柳观龙子湘军轰城处作》、《送吴雨僧之奉天序》、《雪夜偕杨(铨)吴(宓)二君饮酒肆》等诗,表明二人相处甚密。柳诒徵在南高—东大校内的活动非常活跃。1919年南高时期,他就曾任学生自治委员会、图书委员会、出版委员会、选课限度委员会、改良考试委员会委员(参见《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各委员会名单》,《中央大学史料选》,《南京大学百年实录》上卷,第66~6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他还在多个学生自行创办的研究会中担任指导员,如史地研究会、文学研究会与哲学研究会、国学研究会等,并指导学生创办会刊,时常为这些会刊撰文(参见陈宝云《学术与国家:史地学报及其群体研究》,复旦大学历史系2006年博士论文)。在众多名师汇集之地,柳诒徵的交往范围十分广泛。如“中国科学社”在1918年迁入南高之后,柳诒徵与其社员多有交际,随后也成为其中的一员。这一点茅以升在回忆中也曾提到:“先生毕生致力文史,著作等身,但对自然科学亦极为重视,曾参加中国科学社为社员,出席各种学术会议。”(参见茅以升《记柳翼谋师》,《劬堂学记》,第63页)柳诒徵之女柳定生在《柳诒徵传略》中也说:“先生虽专攻文史,对自然科学亦感兴趣,曾参加中国科学社为社员。”(《江苏文史资料集粹》教育卷,南京出版社,1995年)

吾国圣哲思旨相翕丽,以祈庸民而靖俗者,不数数遘。宣城梅子迪生,首张美儒白璧德氏之说,以明其真。吴子和之,益溯源于希腊之文学美术哲学。承学之士,始晓然于欧美文教之自有其本原,而震骇于晚近浮薄怪谬之说者,所得为甚浅也。梅子吴子同创杂志曰《学衡》以诏世。其文初出,颇为蜚俗所诟病。久之,其理益章,其说益信而坚。……二子者各以一身肩吾国文教之责,使东西圣哲之学说炳焕无既。<sup>[8]121</sup>

## 二、柳诒徵在《学衡》社中的处境

《学衡》是一份同人杂志,柳氏加入《学衡》,自然与吴宓、梅光迪等人有一些思想共识。梅、吴两人反对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也不怎么认可西方学界的中国学研究。如梅光迪称:“西人所著论吾国之书,十九谩骂吾人,不欲多读,此等书吾辈视之,不值一笑。而其势力影响于其本国者至巨,甚可痛也。因彼辈绝少通吾国文字者,况问其能读吾古籍(李佳白、孙乐文辈,不过读《纲鉴易知录》及《四书合讲》),彼辈书中不过有几张吾国下等社会人相片,以为足代表吾人,岂不可耻。”<sup>[9]</sup>而柳氏认为,欧战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两种思潮:“一则欲输入欧、美之真文化,一则欲昌明吾国之真文化”;而吾国人以昌明东方文化为吾人之大任之念,乃油然而生。又进而以儒家之根本精神,为解决今世人生问题之要义。<sup>[10]</sup>应该说正是这种“欲昌明吾国之真文化”的渴求发生共鸣,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但《学衡》杂志内部俨然是新旧两派。“融化新知”的大抵是清一色的留美生,如刘伯明,东大副校长、美国西北大学哲学博士,梅光迪,西洋文学系主任,哈佛大学硕士,胡先,生物系主任,留美植物学博士,吴宓,西洋文学系教授,哈佛大学文学硕士,萧纯锦,经济系主任,留美习经济专科,徐则陵,历史系主任,留美习教育专科。“昌明国粹”的主要是功底深厚的柳氏与马宗霍二人。柳氏没有留学背景,当时任历史系教授;马宗霍是王湘绮晚年的门生,经学功底扎实,后为章太炎的弟子,治小学颇见功力。<sup>[4]127-228</sup>在这一背景中,柳氏立场在《学衡》社中褒贬不一。其所撰的“发刊辞”因为只有简单的四条,就遭到了马承 讥笑,<sup>[4]128-229</sup>但仍得到大多数人的肯定,这与吴宓的支持有关。

吴宓对柳氏甚是钦佩,自述在任教南高以前就读过柳氏的文章和著述。在1921年下半年的开学典礼上,吴宓第一次遇见柳氏,之后一再称其为南高“博雅宏通”第一人。他认为:“比而论之,梁先生名较大,柳先生则有梁先生所不能及之处,梁先生生前亦甚推重柳先生(宓为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时,拟增聘柳先生为教授,梁先生首极赞成)。若言私谊,则柳先生对宓较亲切,本诗集之序文及题签,惟请柳先生为之,宓盖深思而后行焉。宓与柳先生始相识,即同为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故宓云:平生风义兼师友。然柳先生乃实宓之师也……”<sup>[7]112</sup>他还替柳氏抱屈感叹:“若其出处行事之迹以及名声之大小显晦有异,则时世与境遇为之,然柳先生亦有友有敌,受崇拜亦受谤诽,老去郁郁,宏愿素志不得展。”<sup>[7]113</sup>他责怪刘伯明用其同学徐则陵而不用柳氏做历史系主任,认为这是“刘伯明之过”、“东南大学之羞”;梅光迪在介绍柳氏时,只是道及姓氏而不及其他,也是“梅君之过”。<sup>[4]1230</sup>东南大学在1925年发生“易长”风潮,《学衡》同志纷纷出走,柳氏由吴宓荐入东北大学,吴并极力运筹欲将柳氏送进清华国学研究院,但多次提议终不成。<sup>②</sup>吴宓诗更可见其对柳氏的肯定与尊敬:

书上柳翼谋先生(1924年8月)<sup>[8]123,131</sup>

平生风义兼师友,三载追陪受益多。论学长才通由合,阅人巨眼照修罗。  
文明启钥诚新史,正气盈科发浩歌。两度江干劳伴送,云天怅望思如何。

天津谒柳翼谋先生即席呈赠(1925年8月13日)<sup>[8]131</sup>

奇才磊落数公多,半载重逢意若何。阅历人情知险怪,坚持正义挽颓波。  
龙潜北海雄吟啸,凤去南天笑网罗。辽左今来形胜地,群贤领袖壮山河。

① 1924年10月,直系军阀被推翻,政治局势大变。1925年1月6日新任教育部长易培基发令罢免郭秉文的校长职务,原因是其依附军阀。消息传来全校震荡,此乃有名的“东大易长”风波,历三年而未息,此后“学衡派”教员纷纷出走。详细内容可参见张朋园等《郭廷以先生访问纪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罗时实《十四年的东大学潮与我——成贤街回忆之二》(载《传记文学》1卷5期,1962年10月)等。

② 据《吴宓日记》(第3册,页251)载:吴宓曾多次向清华提议聘柳氏,但终功败垂成。1926年11月16日记:“校中必欲聘傅斯年等以授中国文史,而宓不肯聘柳公。不得不为本校惜,且为世局哭也。”

吴宓对于柳氏在《学衡》中所扮演的角色评价以及他们同志情谊的表达,也凸显了柳氏在《学衡》中的影响力。

另外两名《学衡》主将胡先 和梅光迪也很赞赏柳氏的学问。胡先 初至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即极口称柳氏主讲的《中国文化史》“不蹈昔人之蹊径,史学史识一时无两”;其门弟子多能卓然自立,时号称柳门,正与当时北京大学之疑古派分庭抗礼焉。<sup>[11]</sup>1948年又称柳氏“自来南高,主讲中国文化史,三年而成巨著,开斯学之先河。当时北方之学风,以疑古为时髦,遂有顾颉刚所主编《古史辨》之行;一般关于史学之研究,亦集中于史料或小问题之探讨。于是《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正史可以束之高阁,而《洛阳伽蓝记》一类之书反认为不能不读。南高、东大之史学在柳先生领导之下,则着重在史实之综合与推论,其精神与新汉学家不同,此则柳先生之功也”。<sup>[3]</sup>胡先 生性爱诗,柳氏任教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时;与王伯沆共晨夕,王喜谈诗,赣人胡先 、邵祖平亦昵就”。<sup>[7]</sup><sup>20</sup>所以,二人在诗方面也应该比较相投。胡先 的回忆亦可为证:“戊午执教南庠,得纳交苦宿柳翼谋、王伯沆两先生,朝夕请益,所获良多……”<sup>[7]</sup><sup>16</sup>梅光迪对柳诒徵也是赞誉有加,他将《学衡》与柳氏指导的《史地学报》视为新人文主义在国内的两大重镇:

和美国的人文主义者一样,中国的人文主义运动的支持者也是大学里的学者。他们的文学机构主要是《学衡》,一本创办于1922年的中文月刊。其主编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吴宓先生。他是中国人文主义运动最热忱而忠诚的捍卫者。……中国人文运动另一重要出版物是《史地学报》,由著名作家、历史学家柳诒徵先生主编,他目前正在南京的国立图书馆担任主管。与这两位有交情的朋友和他们的学生都是这场运动的推动力。需要指出的是,这当中许多人,像柳先生一样,都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完全在中国文化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sup>[2]</sup><sup>222-223</sup>

这些论述表明,尽管由于教育、学术背景的不同,柳氏的立场在《学衡》社中褒贬不一,但柳氏的确因其在东南大学的影响、国学功底之深厚与治学态度的圆融,不愧为《学衡》的重要支柱,乃至日后《学衡》的停刊与其都有密切关系。

### 三、同中之异

南高学生李清悚回忆说:“南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般教授是保守派,该校所出的《学衡》杂志用文言文始终不变,在当时学术论坛中总是反对进步思想的立场。这个学派的主将是刘伯明和梅光迪。但学衡派的思想并不代表全校师生的思想,尤其是科学社的社员杨杏佛、任鸿隽、秉志、竺可桢、胡刚复、胡明复、柳翼谋等,在学术思想上代表进步的一方面。”<sup>[12]</sup>且不论他以“进步”与“保守”的标准来区别柳氏与《学衡》同仁是否准确,但细阅柳氏在《学衡》中的作为,我们确实可以发现其中的些许差别。

吴宓称,与《学衡》杂志敌对者,为上海“文学研究会”之茅盾一派、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学灯》之编辑邵力子一派以及上海“创造社”郭沫若一派。<sup>[4]</sup><sup>235</sup>显然,这主要是从文学的角度立论的。《学衡》文章中实际批评的正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及其言论。直接点名批评的文章也很多,如《论新文化运动》、《敬告我国学术界》、《评近人之文化研究》、《评杜威平民与教育》、《评 尝试集 续》等。

而柳氏直接批评新文化运动的文章很少,只有《论中国近世之病源》(载《学衡》第3期)一文论及新文化运动的反孔。文中,柳氏并不反对新文化运动,认为新文化若可行于中国,乐见其成。孔子只是一个被运用的招牌,反孔子是一鼓动口号而已。但不论是新文化还是孔子之招牌,若真能行于中国、帮助中国,那孔子教与新文化道德无异。

实际上,柳氏批评的不是“新文化运动”本身,而是“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一种广义的过度侮蔑传统的学术风气,主要针对的是反传统所产生的大量不健康的“臆造意识”,“舞弄”“科学客观”“口号”的现象。在1921年《学衡》还未创刊时,他就在《史地学报》1卷1期发表《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针对章太炎、梁启超、胡适三人著作中的谬误提出批评。这篇文章批评极当,但在当时的学界反响不大,原因是胡适和梁启超对此大力批评均未“响应”,只有章太炎回文感谢,承认“年少轻狂”。

柳氏对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反对与批评不多,与他平心静气、不争意气的治学理念有关。对于新文化的建设,柳氏更多地是从学术的角度、从民族竞争的大势中去探讨。他与弟子们创办了《史地学报》等一系列学术性较强的刊物,特别强调史地学为各学科发展之基础,要积极阐扬传统史地学之“积绪”,促

进史地学之新发展 积极“争衡于世”。这些刊物,很明显地展现了柳氏带领弟子们积极致力于谋求中国现代学术文化转型的热忱和努力。<sup>①</sup>

在此基础上,柳氏提出了中国文化“西被”问题。如果说这也是对胡适等人“西化”主张的一种回应的話,但柳氏却又完全不同于《学衡》。后者非常鲜明地以西方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立足点,进而特别注重对西方文明尤其是希腊文明的阐述,而柳氏则是立足于中国学术研究的本身。他认为,学者的责任就在于研究揭示本国本民族文化发展的独特之处,以享世界。中国文化之所以要而且能“西被”,最根本的一点就在于“吾国独异于他国”的特质,即人伦精神。他批评国内学者只着眼国内,不求学术对外之发展,就其学问内容也不是中国独特之处。“吾国文化,惟在人伦道德,其他皆此中心之附属物。训诂,训诂此也;考据,考据此也;金石所载,载此也;词章所言,言此也。亘古及今,书籍碑版,汗牛充栋,要其大端,不能悖是”。<sup>[13]</sup>柳氏的中国文化西被主张,反映的正是他在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入侵之时的一种应对策略和依靠文化来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努力,在这背后支持他的或许正是柳氏自己对本国人伦文化的自信和表宣本国文化的决心。<sup>②</sup>

综上所述,尽管《学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柳氏的支持,但二者在观念上亦有不少相异之处,更重要的是,二者对手方的不同,也带来各自关注的焦点和表现形式的不同。如果从价值取向来看,《学衡》在新文化建设路向上的选择表明,后来研究者称他们为文化守成(保守)主义者是不为过的。而柳氏在学术文化竞争的场景之中与民族自立之急切要求的情势之下,“与西方争胜”的民族主义诉求则表达得更为明确和深切。如果说《学衡》的追求被看作文化保守主义的话,那么柳氏的追求则更充满了文化民族主义意识。<sup>③</sup>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思想界异常复杂,不能简单地以“保守”与“激进”,或是“守成”与“进步”等来作二元或三元的区分,这已成为当前学界的共识。同样,对于柳氏和《学衡》,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前者只是学衡派中的一员,而忽视了其间的差异与各自的特性。认识和分析这种复杂性与差异性,对于推动研究的深入,无疑有一定意义。

## 参考文献:

- [1]钱基博.《国学文选类纂》总叙[M]//钱基博学术论著选.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8.
- [2]梅光迪文录[M].罗岗,陈春艳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 [3]胡先.梅庵忆语[M]//子曰丛刊第4辑.上海:子曰社出版,1948.
- [4]吴宓.吴宓自编年谱[M].北京:三联书店,1995.
- [5]吴宓.吴宓日记第3册[M].北京:三联书店,1998.
- [6]吴宓.吴宓日记第2册[M].北京:三联书店,1998.
- [7]柳曾符,柳佳.劬堂学记[M].上海:上海书店,2002.
- [8]吴宓诗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9]耿云志.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M].合肥:黄山书社,1994:61-63.
- [10]柳诒徵.中国文化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6:869-870.
- [11]胡先.文存[M].张大为,胡德熙,等编.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503.
- [12]李清悚.南京高等师范和东南大学[M]//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江苏文史资料集粹·教育卷.南京:南京出版社,1995:3.
- [13]柳诒徵.中国文化西被之商榷[J].学衡,1924(27).

责任编辑 张朝胜

① 具体阐述可参阅拙著《学术与国家:史地学报及其群体研究》,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6年。

② 参见前引笔者的博士论文。至于“西化”之大势下,柳诒徵提出“文化西被说”的缘由因果,还需另文阐述。

③ 柳诒徵的文章基本以阐述、宣扬中国文化精神为中心,而在其指导下的《史地学报》关于外国史地的文章分量也以西洋(欧美国)为重,对于朝鲜、印度研究的两篇文章其侧重点还在中国。由此亦可验证其以欧美为对手方,以图民族国家新史学建设之努力。此后,柳诒徵又与其弟子们几次聚合,创办了一系列史地学刊物,积极宣扬中国文化,谋求史地学的现代转型,更可证明这一点。